

陶行知先生在香港

盧瑋鑾

前 奏

1936年夏天，「世界新教育會議」第七屆年會在倫敦舉行。以實踐「生活教育」、「教學做合一」教育理論及提倡「小先生」制度著名的陶行知先生應邀出席，報告經驗總結情況。1936年9月，他又到比利時去，以中國執行委員身份，參加「世界和平大會」的第一次大會。會議結束後，他受了「救國會」的委任，負上國民外交的使命，到歐美各國去宣傳抗戰，讓世人了解中國為什麼要抗戰。對於他自己來說，這也是一種學習的新方向，所以他說：「我現在預備遊歷半個世界，好一比是進了世界大學。」^①為了向國內傳遞所見所聞，他就「每逢看到、聽到、想到、做到的事，有一些歡喜寫下來，因為遊踪不定，只好遊到那裏，寫到那裏，所以叫做遊稿。」^②他投稿的方法也很特別，是用複寫紙，複印許多份，分別寄到各報館去。他要求的「稿酬」是：「凡登載九張遊稿者，請寄貴報一份。如蒙複印遊稿數份一併寄來，更為感激。」^③

1936年冬天，他在美國從事團結洪門、聯絡華僑，發動獻金救國等工作。對於本來分門別戶的舊金山、芝加哥、紐約華僑聯合起來，為祖國抗日而努力，他認為這是「新華僑從舊的背景裏活躍起來，也好比是新生的孩子。」而自己「也可算是接生婆之一。」^④

到了1938年，一方面因為國難期中，教育的實施需要熱心而切實推行的好手；另一方面參政會要召開了，身為參政員的他，也希望能在國內推展適合社會需要的教育方式，發揮他的影響作用。於是，在6月15日由美國啟程，經歐洲大陸、埃及、印度、星加坡回國。8月30日下午5時，法國郵輪「霞飛將軍」把他帶到香港。這位著名中國教育家在香港期間，展開了宣傳抗戰、推行業餘教育的行動，同時也發表他要做的三件大事的內容。

活動與演講

到了香港，還沒上岸，就在郵輪上接受記者訪問，他談華僑行動、國際形勢和漢回統一等問題；特別對於各地華僑的愛國行動，他認為最令人感動。

第二天中午，香港部份文化人為了歡迎他和鄧穎超，在九龍塘的一個俱樂部裏舉行聚餐會。在會上，他說自己離開國家已經兩年零一個月，但可報告的事却並不多。不過對於捷克，他還是談了許多。首先他提到由美國到歐洲的船上，遇到二百多名捷克青年，他們怎樣有秩序地組織

起來做國民外交宣傳工作，表現良好的國族精神。繼續他談到在捷克的所見所聞。這時候正是德國對捷克虎視眈眈之際，他特別強調這個小國的團結精神，又認為德國要侵略它也不容易，大概想借這件事，告訴國人團結抗敵的重要性。

陶行知先生到了任何地方，都立刻投入宣傳抗戰的行動中。在香港自然也不例外。他出席各種集會和作專題演講，特別在演講中，以「通俗口吻探討高深之學理，且莊諧並重，談笑風生，極得聽眾的敬佩。」^⑤

他在香港停留一個多月，10月初回國內參加第二次參政大會；1939年1月初又再到港，直到1月30日才再離港到重慶參加第三次國民參政大會。現在把他留港期間主要的活動和演講題目開列出來，從中足可反映他接觸面的廣闊。

- 1938年9月1日 在「青年會」作公開演講，講題：
作 《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》。
- 1938年9月2日 出席香港四婦女聯會的歡迎會並致詞。
- 1938年9月8日 在「香港女子體育籌委會」對教育界演講，講題：《健康教育問題》。
- 1938年9月9日 在「香港中小學教師座談會」演講，講題：《戰時教育問題》。
- 1938年1月6日 出席「香港記者座談會」新年聚餐會，並談《政治問題》。
- 1939年1月7日 在九龍「德明中學」對學生演講，講題：《抗戰現況及學生應負之責任》。
- 1939年1月8日 出席「業餘聯誼社」成立大會並致詞。
- 1939年1月12日 出席「中國青年記者學會」新年聚餐會，並談《廣西情況》。
- 1939年1月24日 在紅磡「自強體育會」為工人演講，講題：《新階段的抗戰形勢與工人教育》。

教育理想的實現——中華業餘學校

陶行知先生在1938年8月底來港，曾對記者發表了他回國要做的三件大事：「一是創辦曉莊研究所培養高級人

材，二是辦難童學校，收容教養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苦難兒童，三是辦店員職業補習學校，動員華僑抗日。」^⑥爲了實現第一第二件事，他在香港召開曉莊學院校董會議。出席的校董有：張一鑾、許世英、李晉、何艾齡、楊德昭、吳涵真、張宗麟（方與嚴代）、陶對庭（陶行知代）、陶行知等九人，由張一鑾主席，方與嚴紀錄，即席通過籌設「曉莊研究所」並訂定章程。同時更議決創辦育才學校及訂出意見計劃書^⑦。所以，可以這樣說，在中國教育史有着特殊意義的「育才學校」，是在香港孕育出來的。

至於第三件事，他更立刻付諸行動，在香港推行了，這就是設立「中華業餘學校」。

「『中華業餘學校』創設於1938年11月。董事長是陶行知，副董事長是黃澤南，校長是吳涵真，主任是方與嚴。校址在九龍山東街五十三號至五十九號的「中華兒童書院」。^⑧

這所學校的教育精神是直接承受「曉莊」理想，面對的却是香港這個工商業社會。他們認爲：「本校不是屬於少數人的，可說是師生共有的，推而廣之，也可說是社會共有的，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創造，共同來做好。」^⑨又由於「我們不想把教育再關在少數知識份子的小圈子裏兜圈子，我們要把教育範圍擴大。」^⑩所以除了設文藝、音樂、繪畫科外，還設工商科。

這是所夜校，設計上完全適合失學或失職而有意求長進的青年人。每三月爲一學期，每科授課時間共二十四小時。收費是每期港幣五元，講義不另收費。校方按學生程度分成甲、乙、丙三組，學生可自由選科。學習過程充份發展個人能力，也注重集體主義的自我教育。^⑪

有關該校工商科的情況資料不多，因此無法知道它是不是很配合香港社會需要。但文藝、音樂、繪畫等科，則毫無疑問，有一定的影響力和成果。首先，看看講師的陣容。第一期文藝科講師是茅盾、林煥平、適夷。第二期文藝科講師有：孫鈿、黃繩、劉思慕、樓棲、蔡磊、方與嚴。音樂科有蔡自新。戲劇科有：歐陽予倩、胡春冰。再看學生人數：第一期獲結業證書^⑫的有二百多人，第二期獲結業證書的二百多人。爲了學和做要配合起來，他們在第一期中，已組成水準不低的「中華業餘合唱團」和「中華業餘戲劇團」。1939年3月，還以「中華業餘學校校友會」名義出版會報《業餘》。^⑬由於第一期招生反應不錯，第二期便計劃在香港灣仔洛克道280號明德學校設立第一分校，並增設了英語科。1939年5月籌辦了婦女義學，公開的圖書館也在力求擴展中。

「生活即教育」、「社會即學校」的精神，也充份在學生的活動中表現出來。例如他們應響了「中國青年運動週」，舉辦夏令營爲長洲漁民服務，參加救亡籌賑演出；文藝創作在《立報·言林》、《大公報·文藝》中刊出，更有學生回國參加抗日行列。在這所學校裏，「青年的講



陶行知與趙老太太 1938年9月14日攝於九龍
原載吳涵真著《苦口藥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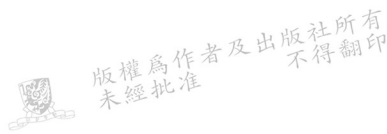
師倒也很得青年的愛戴和擁護，那種嚴肅、活潑、親愛的空氣，就只有在青年羣隊中間才會有的，而青年文藝運動的幹部也在這樣的空氣裏面養起來。」^⑭

這所在短期內表現得有聲有色的業餘學校，陶行知先生是催生者。可惜當時的局勢動盪，講師流動性大，加上不久，吳涵真和方與嚴都相繼離港，校務乏人主持，雖然校友會曾發起救校運動，但到1939年9月，也無法支持下去，宣告停辦了。

儘管這所學校只辦了11個月，在香港教育史上只如電光一閃，但仍不失一種光輝標誌——陶行知的教育理想的實現。

詩歌作品

陶行知先生的「陶派詩」^⑮，是以通俗淺白，不避口語見稱的，凡有所見所感，都可立刻入詩。在留港期間，他也作了不少詩歌，特別有兩件事令他十分興奮。第一是與趙老太太遇上了。趙老太太外名叫「游擊隊之母」，兒子趙侗是著名義勇軍領袖，她老人家就到處宣傳抗日，也爲軍隊募籌衣物藥物經費。在港時，陶行知先生跟她一同出席了許多歡迎會，又和她在九龍一所照像店合攝了一張照片，（見附圖）更寫了一首長詩送給她。（見附錄《敬送趙老太太》）另外一件事是他經歷了一次本港僑胞獻金救國的熱潮。這次叫「八一三」獻金運動，可以說是波瀾壯闊的一次愛國捐款行動，其中以九龍區及中區的菜果、



鮮魚小販的熱烈捐輸，更是驚人紀錄——九月的募款結算，竟達港幣三十七萬元^⑮。陶行知先生也為中區商販義賣寫了一首詩。（見附錄《為香港中區商販義賣紀念特刊題詩》）

結語

陶行知先生在香港只短短兩個月，但他的活動範圍很廣闊，而活動的意義也很重大，可惜尚未見有較詳細的記載，我從當年報刊上搜得一些資料寫成此文，表示對這位平民教育家的敬意。由於資料很零碎，所以寫來不夠全面，希望將來有機會補充。

① 見《九張遊稿說陶行知》，原載1937年3月19日《大眾日報》1張1版。

② 同①。

③ 同①。

④ 見《新華僑之出現——在美國所見》，原載1938年11月25日《大眾日報》2張5版。

⑤ 《陶行知昨在自強會講抗戰教育》，原載1939年1月25日《立報·教育界》第7版。

⑥ 白韜，《回憶陶行知先生》，131頁，1948年7月，光華書店。

⑦ 見《實行全面教育籌設曉莊研究所》，原載1939年1月28日《立報增刊》第7版。

⑧ 見《中華業餘學校招收學員》，原載1938年11月1日《立報》第2版。

⑨ 方與巖《誠懇的接受社會指導，答覆黃繩先生兼告社會人士》，原載1938年12月16日《立報·言林》第2版。

⑩ 同⑨。

⑪ 有關該校組織、課程安排、講師姓名等資料，散見於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間的《立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中。

⑫ 由於該校主張：「生活即教育」，人生一天，即要受一天教育，永遠不畢業，故不發畢業證書，只發結業證書，以適應社會需要。

⑬ 此刊物各見於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》13卷6期，1939年5月30日，7—10頁，毛宗蔭，《全國雜誌調查表讀篇二》文中。因未見原書，未知內容。

⑭ 黎夫，《伙伴們！我們的旗子》，載《青年與文藝》146—162頁。欠出版日期。耕耘出版社。

⑮ 白韜，《回憶陶行知先生》，138頁。1948年7月。光華書店。

⑯ 有關捐款數字見1938年9月5日《星島日報》第8版。

